



新观

作为文化表征的类型文学

□乔焕江

当代文学和文化中的一大景观,当属玄幻、职场、校园、穿越、盗墓、悬疑等等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只消稍稍留意那基于网络空间的海量作品和更为海量的点击率,就应当承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与其悄然兴起相比,类型文学对当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更不容小觑,亟需批评对其加以理性和反思和合理定位。

类型文学改变了当前的文学格局

有必要指出的是,类型文学热也许并非文学传统中雅俗问题的当代延续,而是当下文学和文化格局结构性变化的表征。传统文学中具有类型化特征的通俗文学时常与雅文学和纯文学之间有某种潜在而持续的良好互动,如果说这一关系并没有改变甚至反过来强化了由后者所主导的文学秩序和文化格局,那么,出现在新世纪的类型文学则有可能正在静悄悄地颠覆这一秩序,足以打破既有的文化格局。实际上,对于当下类型文学的读者群来说,纯文学及其价值范式或许在更大意义上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话语,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而类型文学却更多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紧密相关,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意义来源。

关于这一新的文学“热潮”,很多人都已及时发现并指出了其文化世俗化的时代动因:诸如大众审美意识的兴起、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商业资本介入出版行业等时代因素,都可说是类型文学风行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类型文学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当下的某些具体问题,迎合了大众的某些文化需求和审美意识。比如,随着现代分工的日益细化,知识分化的速度迅速加快,个体的知识视野越来越狭窄,而诸如悬疑、推理、盗墓等类型小说则提供了大量专门性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深陷于分工角色的个体而言,无疑是新鲜、新奇的。再比如,现代城市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和程式化使个体产生厌倦感和无聊感,而穿越小说以其对时空的任意穿越和身份的瞬间转换,给读者带来传奇般的愉悦想象。又如,当代青年在其校园生活或职业生涯中时常产生多样的情感困惑和人际难题,校园小说和职场小说无疑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更为切近的纾解方案。此外,类型文学更多地基于网络空间这一特征,无疑使得创作门槛降低,最大限度减轻了阅读的各种外在压力,使类型文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狂欢化的文化品格。然而,因此就得出类型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乐观前景,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大势所向,甚至由此认为类型文学是接续甚至取代文学传统的时代文学形态,则显然有些草率。

一个社会的文化格局的变动往往是社会结构变动的体现,而这一变动的文化无疑同时又意味着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塑形。新世纪以来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并不只是文学传统自身的某种技术性和时代性变异的结果,而是同时潜藏着社会结构中新兴力量的社会书写意图,尽管这一意图包含了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商谈乃至妥协。必须注意到,在类型文学兴起的背后也许还有资本对于社会结构的书写意

图,这种意图既体现在使类型作品“经典化”的网络推手、市场策略等较为显在的因素,更潜隐于类型文学作品模式化的文本构造之中,而后者因其与读者心理之间的隐性互动,则更具意识形态效应。换句话说,类型文学正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参与到了当代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当中。因此,对类型文学的判断就必须与当代文化格局的变动关联起来,必须与当代文化格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起来,对类型文学的研究和思考需要对类型文学的发生条件、生产条件、传播条件及其接受群体等物质性环节和历史性因素加以整体性考量,对其文本意义生产的模式化手段及其接受效应加以深度审视。这意味着批评在面对类型文学及其热潮时,应当具备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空间结构性的自觉,跳出日益逼仄的纯文学传统的批评空间,深刻揭示这一现象所负载的文化意图,而不是仅仅考虑为类型文学谋得文学传统上的合法地位,或者将之排斥出既有文学传统的价值体系,纠结于“类型文学是否具有文学合法性”、“类型文学的文学性程度高低”等这类表层化的问题。

类型文学体现出时代的文化症候

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观之,大多数看起来强调娱乐性休闲性的类型小说,其深层却更表达了大量个体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尽管某些作品也会触及到某些局部性的社会问题,也会表达个体的某些诉求,比如校园小说对僵化教育模式的嘲弄,职场小说对资本冷酷本相的透视,官场小说对腐败问题的暴露等等。但在这些问题面前,类型文学显然缺少足够的诚意和勇气,现实问题往往只是小说展开故事的话题和谈资,对于问题本身,主人公绝无理性反思或追问,挑战到底。于是我们看到,面对问题重重的现实空间,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从无奈认同最终在其中厚黑有余,或者凭借某个偶然机遇如鱼得水顺势翻身,或者干脆穿越到前朝旧代和“异次元”时空,在冥想的传奇或“同人”故事中达致欲望的想象性实现。已经有少明眼人指出类型文学现实精神缺失这一致命伤,但在我看来,这种弊病并非缘于作家个体能力的先天不足,而是来自这一时代整体性的文化氛围,受制于类型文学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目的。类型文学对点击率和销售量的追逐,使其与资本的殖植模式和市场策略更为紧密地媾合在一起,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定位模式,简单粗糙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套路化、模式化的写作策略,都不可能使其对现实问题的复杂状态和深层根源认真探察并详加呈现。因此,尽管类型文学作品中可能存在局部的或细部的对现实中某些问题的回应,甚至在文本层面显示出某种区别于现实世界整体性的乌托邦或“异托邦”色彩,但其对生活世界的任意删减,其简单化的问题处理方式,都使得小说最终脱离了现实。更为重要的是,类型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对感官欲望的即时满足,使读者获得意义在场实现的幻觉,从而消解了其在现实中的真实需求;同时,类型化的故事更容易使读者形成某种类型化的情感模式和价值判断模式,

甚至形成一些具有类似“亚文化”特征的读者群落,而这客观上又可能阻断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基于现实空间的真正对话和交流——因为在想象空间中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理想关系状态,个体在现实中就缺少了理解他者的动力,这样一来,现实中的关系状态就可能更趋于零散化和断裂化。

看似只追求“悦读”效果的类型文学作品,由此实际上成为对社会现实问题深入反思的阻隔,而其大规模、模式化的自我复制策略,反过来又会产生造成社会关系零散化的政治化效应。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翻检几部已经“经典”化的类型小说就可以发现。在这些作品中,那些使主人公借以超越现实或在现实中获得自在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往往与陈腐的、功利的和犬儒的思想意识相伴,比如大量“后宫”类的穿越小说,看起来像是对纯真爱情的张扬,却时常与性别、金钱或权势等特权手段保持暧昧的关联;大量职场、商界小说,虽有对资本残酷本性的体认,但其对“职场圣经”、“商界厚黑”的推崇,反过来强化了资本所编织的等级神话。与此相对,那些能够对现实进行深度反思的优秀精神资源,类型文学则很少使用,在作品中,富有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总体性的现实关怀和严肃的批判精神甚至屡屡成为戏谑和拒绝的对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模式化的小说结构限制了个体理解现实和重构现实的创造性思考。在类型文学的实践中,文本深层潜在的价值观念被表征为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念,文本语言所带有的腔调和格调被表征为一种无功利的审美趣味,文本所表现的关系结构被表征为一种自然化的结构模式,而在商业出版资本和资本的网络推手的推动下,这种文学形态的畅行无阻,最终取消了我们寄望于文学对现实更为复杂和独特的审美性思考,甚至挤兑和压缩后者的生存空间,乃至造成文学传统的中断。

市场化转型以来,文学风格、文学趣味的丰富,文化产品的多样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觉醒了的审美意识,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审慎对待潜在在这些多样化的品种背后的文化意图及其文化效应。即以类型文学来说,这种以满足大众休闲娱乐的产品为直接目的,以通俗乃至粗俗为风格而出现的文化形态,绝非文学自身的内在延展,在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变革的当口,它们对文学格局的改写提醒我们注意其背后潜在的结构性力量,这种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统观的文学,“不仅是结构化了的结构,而且是能结构化的结构”(赵毅衡语)。对于这一方兴未艾的类型文学潮,批评亟需一种结构性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视野,以对其实义编码方式进行有效的解码,发现那些潜藏在娱乐和浅显背后的深层意图。这无论对于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类型文学实践本身,都是紧要而迫切的。

“类型文学”现象笔谈

■新作快评 朱日亮《氓》,《收获》2010年第4期

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有一本小书叫《小说神髓》,其中提到“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我深以为然。虽然这不过是朴素的道理,它的机微却鲜有人能体会。我们看当下的小说创作,写人情者多矣,似乎这一点根本无需多说,然而往根底上看,却大都是喧嚣的欲望,人情的复杂都被忽略掉了。在我看来,人情无疑是一道富丽的光谱,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写出人情的诸种形态,包括它与道德、礼法、伦常相龃龉的那些形态。在当代的文学艺术中,我感到,通过“残疾”来书写与礼法冲突的“人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本修辞方式。在这些文本中,人物的致残往往成为叙事的转换点,在意义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朱日亮的小说《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关注。

我们都知道,《氓》是《诗经》中一首著名的“弃妇”诗,朱日亮以此为名,很容易让人去揣摩它与这首诗之间的互文关系,难道朱日亮要在当代重写一个“弃妇”故事?若果真如此,也毋宁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不仅千百年来的文学史上时时回荡着“弃妇”的悲戚,当代频频上演的“小三儿”故事也在不断壮大着“弃妇”的文学连队。然而一篇读罢,我们发现,朱日亮无意加入那种简单的道德讨伐,他倒转了性别乾坤,让男性充当起第三者角色,写了一个单身汉“特殊”的爱情故事。可以感觉到,朱日亮是要通过这种“特殊”,来写出一种不合于礼法,却又使惯常的道德审判无处置喙的人情。

小说的主人公叫许家乐,年已不惑,却从未婚娶,是个认真、刻板而又吝啬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诗经》情有独钟,时常吟诵“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有美一人,婉如清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诗句隐隐附和了一个单身汉的心曲。对爱情的渴望,也由此可见一斑。但令人奇怪的是,别人给许家乐介绍女朋友,他却毫无反应,即使是校长的小姨子他也拒之千里,这就成为咄咄怪事。缘何一个单身汉对女人如此绝缘?原来他早就心有所思。只不过所思者,虽不在大海南,却早已是有夫之妇。这就把许家乐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道德情境中。因为与有夫之妇偷情,很容易触犯读者心中的道德律。但往下看,我们却发现,朱日亮让那些急切的道德审判挂空了。因为许家乐所思恋的梅清,婚姻并非自愿,是父母之命让她嫁给了一个司机,而司机此时却因车祸高位截瘫。此情此景,何以堪?然而,随后的一段对话,更将我们带入一种有千言万语、却如鲠在喉的情境。梅清对许家乐说:“瘫子没瘫时你还有机会,瘫子截瘫,你就判无期了。”许家乐说:“无期徒刑我也等。”对话虽短,却足以令人叹惋。由此我们看到,这不仅不是一个弃妇的故事,相反是一个不离不弃的故事。只不过这种不离不弃发生在一个畸形的三角结构中。这让我们陷入了一种道德和伦理的窘境,我们很难对人物作出一种道德判断,而这根本的原因,无疑是梅清丈夫的残疾。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小说类型,这类小说中常有残疾人物出现,尽管作者一般对它们墨墨不提,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本情境。在这种情境中,通常的道德或者不再适用,或者显得非常尴尬,因为,它们遭遇了一种特殊形态的“人情”。比如在这个文本中,许家乐和梅清的关系,就很令人同情,而在一般的意义上,他们之间的感情无疑是不合礼法的。类似于《氓》这样的故事,可以说在文学艺术史上俯拾皆是,以致成为一个母题。比如许地山的《春桃》、贾平凹的《天狗》、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都是在讲述着一个残疾丈夫的女性的悲剧处境。他们虽然侧重各有不同,但无疑都写出来了一种特殊形态的人情。

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的伦理,它在宗教与道德之外,别开一种人情的境界。《氓》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情的境界,让我们有了一种超越固有道德的视野。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一书中说道,畸形人之所以被分离出来,当作一个单独的范畴,是因为他对法律提出了挑战。其实对于道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像这样的小说,正是利用了残疾所引发的复杂的道德体验,写出了人情的肌理,写活了小说的眼目。

■评论

底层的美德与操守

——王保忠短篇小说印象 □赵月斌

我注意到王保忠的名字,是因偶然看了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悬挂》。最近集中读了他的《美元》《前夫》《长城别》《家长会》《奶香》《一百零八》《张树的最后生活》《尘根》等一组短篇小说,更可看出保忠所持守的立场及所做的努力。在他的文字里,不仅可以找到原汁原味的现实感,而且总可感受到一抹亮色,无论生活多么阴暗多么糟糕,总还有一缕“接续的光”,映照人们凋敝的心灵。

从内容题材上看,这几个短篇基本上都与所谓“底层”有关。小说的主人公要么是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姑娘、老婆婆,要么是土洋结合的农民工、乡村教师,要么是命途多舛的穷光蛋、光棍汉,即便是混得有头有脸的公家人、土老板,也还是在小地方小打小闹的“小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够富有或者曾经穷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大都受限于拮据的物质条件,或者受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一出生就注定是福浅命薄的“受害人”。所以,保忠所写的人物大都“先天不足”,不是有缺憾,便是有困扰,然而,正因揭开了这宿命般的底子,他们的故事才生出种种变数。

王保忠的短篇小说大体遵循了这样一种叙事路线:平衡的打破与重建。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基本着着眼于常态的生活,并抓住了淹没在常态之中的不安分、不寻常及不确定因素,通过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通常不怎么复杂也不怎么激烈——展开情节,最终往往以“软着陆”的方式,表现出人物与生活、命运的和解。比如《美元》和《前夫》所写的两个女主角,都是老老实实的农家女子,每天的生活总是四平八稳,平淡无奇,她们不需要刺激,不需要悬念,只要正常过日子就够了。但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平静并非铁板一块,当它受到外力干扰时,原本平铺直叙的人生也就有了曲折,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也出现了未知数,于是,原本被生活淹没、被命运吞噬的局外人、边缘人,不期然进入了故事的中心,成了决定故事方向的第一主角。

保忠善于叙写“穷人的美德”。他在一篇访谈录中即宣称:“在民间,在底层,崇高和神圣并没有受到消解,还在一些人心里光芒万丈。”因此,那些“在低处、在路上”的“更需要关怀的人”自然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在小说里所期待的,便是最大限度地发现并开掘“穷人”所蕴藏的光芒,从而发挥文学的化育功能,给读者以希望和慰藉。比如《前夫》中的巧枝及其前夫,无论贫富贵贱,都未失其良善的秉性。“前夫”没有因为贫穷而鄙视,也没有因富有而张狂;巧枝亦非薄情寡义、蝇营狗苟之人。虽然他们各有各的私心、私情,但是都不曾背离人的良心。所以,“前夫”对买来的媳妇(巧枝)心里也是含着“怜惜”,不舍得把她推入火坑,而当喝醉的“前夫”执意开车上路时,巧枝的心也会“不由得悬上了”,哪怕会引火烧身也要把他留下来。他们无缘无分,却都有情有义:“多年前,她还没跟现在的丈夫结婚时,有一些日子还想过他呢,想着回山西看看他,甚至还想到过留在他身边……好像是感到了热,他把衬衣掀开了,露出了厚厚的胸膛。她怔了一怔,却是尽量放低身量、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说出那种足以振聋发聩的真相。

这两年,保忠正在潜心创作他的“甘家洼风景”系列小说,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篇章。

的五万块钱)也放在了床边。她想,等他醒来,就让他把这东西带走,说什么也得让他带走。”看着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也会充满温情,所谓物欲社会,并不缺少真情,缺少的只是一颗未被俗垢包裹的真心。

保忠还特意褒扬了“穷人的操守”。俗语说“人穷志短”,甚而还有人说“贫穷即罪恶”、“贫穷是无能的表现”,毕竟物质第一嘛,要是连肚子都吃不饱,恐怕“安贫乐道,恬于进取”之类的说法也只是漂亮的空话。然而,人之为人毕竟又不仅限于物质生活,况且对某些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来说,“贫穷”就是一种特定的现实,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能力,在那样的境况下,你可以诅咒贫穷,却不可小视那些在困境中仍抱持精神操守的人。《长城别》着重刻画了一对很有风骨的乡村教师:虽然称二斤狗肉就会“心疼得很”,但还是坚守着早已不值钱的信念、理想,甘愿为之吃苦、受累。其实也不一定多么的崇高、伟大——更多的却是卑微、朴拙,就像“城墙上长出一棵高高的草”,他们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不曾切断原乡的根脉,穷乡僻壤也好,闭塞落后也罢,既生于斯长于斯,便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把担当、牺牲当成了自己的本分。他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他们不知道麦当劳、麦当娜、麦道夫;他们只是进窄门、走小路,用芝麻般的小小心眼保守着一片小天地;他们最大的梦想只是和这一方水土休戚与共,让这一脉人烟生生不息。保忠正是抓住了那种纳须弥于芥的“小”,才擦亮了穷人的灵魂,让我们看到了星星点点温恤的光芒。

当然,保忠并非专爱唱“贫而乐”的高调,在正面描摹“君子固穷”的德行时,他也没忘记打探穷者背后的苍凉,既写其不幸、孱弱,亦写其争斗、挣扎;既写其病弱、受难,亦写其希望、救赎。像《一百零八》《奶香》《张树的最后生活》《尘根》等作品,即可归结为“穷人的迷梦”。这几篇小说都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轻喜剧色彩,最终让你咀嚼到的却是沉重的悲剧性,不仅因为它们都有一个苦痛的结局,更因为它们揭示了穷人的梦想及梦想之死。然而,那些破灭的迷梦尽管多显辛酸,却不尽令人绝望,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人自杀,作者还是让“迷人的阳光”照到了死者的脸上。

保忠的短篇小说大都格局谨严,情节集中,人物不多,故事的时间跨度也不是太长,常常选取一个截面或借一个“引子”展开叙事,通过误会、错觉,巧合制造“意外”、抖包袱,有一种类似于小品的短剧风格,给人的感觉就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石子或者直入水底,绽出几圈波纹;或者划过水面,漂出一串涟漪,虽有暂时的动荡,但是湖面终归会回复平静,不会形成创口,也不会留下疤痕。保忠的小说便是撷取了众多不起眼的微小的波澜,只是展示性的、印象性的,但他的写作理念是介人性的,他的“石子”悄悄潜到水面以下,成了故事中最为坚硬又不易察觉的内核。这种内核应该是作者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由此他所写穷人的故事才不会等同于吊嗓子一样的哀哭,而是尽量放低身量、压低声音,心平气和地讲出那种足以振聋发聩的真相。

这两年,保忠正在潜心创作他的“甘家洼风景”系列小说,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篇章。

■关注

1978年初,《歌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因为思想上的开禁、题材上的创新和艺术上的精进,作品一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点报纸纷纷予以转发,全国几乎所有的电台和地方性报纸竞相播或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广大读者自发排着长队购买当期报刊,大中学校教科书先后选录该文。与此同时,徐迟和《人民文学》收到的读者来信数以万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述情形无可争辩地表明,《歌德巴赫猜想》确实创造了那个年代文学的一个神话。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称“《歌德巴赫猜想》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及其以后的报告文学似乎显得波澜不惊。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志是,其间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家和手不释卷的经典性作品。人们惊讶——报告文学整体性地消失“轰动效应”。

何为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这就是某一报告文学文本能够同时吸引并震惊众多读者。报告文学与生俱来就是“被关注的文体”,不被关注或较少被关注都与报告文学的天职背道而驰。如果说这种界定有些绝对,因而有失公允,那么,在长达20年的时间区间内竟少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深度兴趣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就有些不正常了!我们应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一下其中的原因。

中国报告文学在“后《歌德巴赫猜想》时期”失去轰动效应的显著表征,可用三个“不少”来描述。一是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名家不多,较多的是“未名作家”、“无名作家”和“副业作家”;二是经典作品不多,缺少经久耐看、反复传阅的名篇佳作;三是读者数量不多,阅读面大大缩减。

归结起来,导致“后《歌德巴赫猜想》时期”报告文学轰动效应大面积消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报告文学采访周期长,投入成本大,致使部分作家只好忍痛割爱,敬而远之。一般而言,小说等文体更多地仰仗虚构与想象,而报告文学则主要依赖生活积累和题材储备,需要作家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所以有人称之为文学系统中的“腿脚艺术”和“重体力劳动”。

第二,社会迅猛发展,生活日趋复杂,信息急剧膨胀,致使作品容量加大,篇幅拉长。随之而来的,一是书价上涨,二是耗费阅读时间。这不仅有悖于报告文学生成之初的“短平快”原则,而且造成现代阅读中必然出现的“非经济效应”。

第三,受消费时尚的诱导,部分作家急功近利、追求速成,甚至剪辑报刊、堆砌材料,乃至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导致作品内容失真,思想贫乏,艺术粗糙,广告文学、调查报告满天飞,从而逼使读者退出阅读界面。

第四,报告文学作家整体素质有所下降。毋庸讳言,报告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另一个主体原因,就是当前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作家群体的整体素质处于下滑态势,这些素质主要包括思想素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而现在为数不少的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是那些非专业性不知姓名写手,知识结构很不完整,常以猎奇争奇为审美荣耀,写作中甚至不时出现语言不畅、逻辑不通、层次不清、标点不准、错别字满篇飞的退化现象。期待这样的所谓“作家”写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作品,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谭。

第五,社会多元发展,艺术各自为阵,消费空间扩大,造成渐趋理性的读者兴趣不断分散和转移,报告文学随即连同其他文学样式被整体性地边缘化了。

32年前,《歌德巴赫猜想》以赤诚的民主精神和强烈的科学诉求,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引领改革开放新征程的“雄鹰”,充分显示了报告文学自由纯真的本性、热烈奔放的气质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雄浑力量。而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一现实——《歌德巴赫猜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务之急,是要唤醒报告文学这只某种意义上沉睡已久的文学雄鹰!我认为,实现“唤醒”目标的有效途径大体有以下五条:

第一,全社会有义务营造有利于报告文学自由、和谐生长的环境氛围。如前所述,报告文学从来就不是温室里培育出的稚嫩花朵,它天生就是翱翔于广袤的社会苍穹之中或搏击于飞扬的生活浪尖之上的一只矫健的雄鹰!雄